

中西方职场文化底色解码：以《浪浪山小妖怪》和《心灵奇旅》为例

陈敏 王玉姿

湖南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jief.v7i11.19332

[摘要] 职场文化作为社会价值观的缩影,集中体现不同文明对成长意义、人才标准与人生价值的认知差异,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深度渗透于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过程,影响个体职业认知的形成。本文以中国动画《浪浪山小妖怪》与美国动画《心灵奇旅》为研究文本,采用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结合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从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体制认知、自由内涵、价值归宿等维度,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西方职场文化的差异并关联中西方教育的价值塑造取向。研究发现,东方职场文化根植于集体主义和高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个体倾向寻求安全与认可,追求向上流动,与东方教育重集体、重稳定的培养导向高度契合;西方职场文化以个人主义与低不确定性规避为底色,强调超越外在规训、实现自我价值与内在觉醒,是西方教育重个体、重自我实现的理念体现。两部作品虽均聚焦个体成长困境与生命意义追问,但价值导向与精神归宿呈现鲜明文化差异,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职场行为提供了跨文化分析框架,并为中西方教育观念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文艺文本视角。

[关键词] 高低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职场文化; 跨文化比较; 教育文化; 动画研究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Decoding the Cultural Underpinning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orkplace Cultures:A Case Study of Yao-Chinese Folktales: The Little Monster in Langlang Mountain and Soul

Min Chen Yuzei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Province

[Abstract] As a microcosm of social values, workplace culture epitomize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regarding the meaning of growth, talent standards, and life values. Its underlying cultural logic deeply permeates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rocesses, shaping individuals' professional perceptions. Taking the Chinese animation Yao-Chinese Folktales: The Little Monster in Langlang Mountain and the American animation Soul as research texts, this paper adopts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integrates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orkplace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institutional cognition, the connotation of freedom, and value orientatio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shaping orientati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Eastern workplace culture is rooted in collectivism and a high tendency toward uncertainty avoidance, where individuals tend to pursue security, recognition, and upward mobility, 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Eastern educational orientation that emphasizes collectivity and stability. Western workplace culture, by contrast, is underpinned by individualism and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stressing transcendence over external discipline, self-actualization, and inner awakening, reflecting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at prioritizes individuality and self-realization. Although both works focus on the dilemmas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inquiries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they exhibit distinc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value orientation and spiritual destin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cross-cultu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orkplace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offers a literary and artistic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the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concepts.

[Key words] High and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orkplace Cultur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Educational Culture; Animation Studies

引言

在当代社会,中西方关于个体成长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考公热”持续升温,体制内的稳定与“铁饭碗”承载的认同成为众多年轻人的核心追求,同时,“内卷”与“躺平”并存的社会心态折射出青年在压力与迷茫中的生存状态。相比较而言,美国等西方社会虽也有稳定需求,但“追求热爱”“自我实现”更为流行。上述差异根植于不同文明对“自我”“意义”与“社会关系”的认知,且中西方教育的不同培养方式,持续强化着这种价值取向,成为个体职业认知形成的核心底色。动画作为大众文化载体,以通俗叙事承载深层文化逻辑,《浪浪山小妖怪》与《心灵奇旅》分别凝炼了中西方观念与生命哲学,具备典型的跨文化比较价值。

1 作品概述

《浪浪山小妖怪》以《西游记》为背景,将镜头对准了浪浪山上一个无名无姓的小猪妖,故事围绕着小猪妖因在森严妖界体制内机械劳作、遭受压榨而追寻新的归宿展开。作品以微观个体困境映射东方体制文化、教育底色、集体规训与代际期待,精准触达当代青年学生以及职场人的精神焦虑。

《心灵奇旅》围绕中学音乐教师乔·高德纳和灵魂“22号”展开,通过生死穿梭与灵魂历练,探讨工作价值、人生目标与日常意义。作品直面“人为何而活”的终极命题,呈现西方社会对个体热情、自我实现与当下体验的价值推崇。

两部电影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主流价值观,都以小人物为主角反映成长困境与意义,是跨文化比较的理想文本。

2 两部作品的共通性表达

2.1 “小人物”视角下的成长困境。两部作品均聚焦于底层人物,《浪浪山小妖怪》中浪浪山上无名无姓的小猪妖,在浪浪山体系中机械的劳作,被上级榨取,连对母亲倾诉的资格都被“编制”带来的期望所剥夺。《心灵奇旅》中的乔身处纽约都市,淹没于人群中的平凡个体,困于稳定的教职,无法追求生命的热爱。这种小人物视角极具代入感,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经教育塑造步入职场的个体,都能感受到职业发展中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共性困境。

2.2对另一种可能的向往。两部作品的主角都不满足于现状,内心怀揣着对另一种可能的向往。小猪妖在重复的劳作剥削中,听闻了孙大圣与取经之路,发出“我想去外面看看”的呐喊。乔则渴望脱离按部就班的教职生活,登上俱乐部的舞台演出,实现艺术价值的人生可能。对未知与理想的向往,成为两部作品中主角对抗现实困顿的精神支撑。这体现出无论中西方教育如何塑造,个体追求更好的发展是教育中职业引导的核心关注点

2.3对工作与生命意义的追问。两部作品均深入叩问学习价值,劳动意义与生存目的。《浪浪山小妖怪》中,小猪妖被要求制作箭支、刷锅,却始终不知道这些劳动最终通向何方。《心灵奇旅》将这种追问推向极致:灵魂22号因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拒绝

投胎地球;乔在实现梦想后追问“那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两部作品分别以“善意被看见”和“活在当下”回应这一追问,共同完成对现代教育与成长困境的精神回应。对意义的探寻,也是中西方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

3 跨文化视角下职场价值追求的差异

3.1体制的文化意涵与个体选择差异。《浪浪山小妖怪》中,浪浪山妖国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东方体制。这个体制层级森严,权力链条清晰可见,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形式主义盛行,目标画饼、下达KPI,成为体制运转的日常。编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安全感、社会地位和家族荣誉。小猪妖母亲的骄傲并非源于儿子有才华,而在于“咱家出了个端铁饭碗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猪妖向往的“西天取经”,并非逃离体制本身,而是从一个体制进入另一个体制,本质上是这是一种“体制内迁移”,而非对体制的超越,其终极理想“修成正果”、“位列仙班”,仍在体制框架内寻求归属与上升。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东方职场教育文化的核心特质:个体是在体制间择优,而非否定体制本身。

反观《心灵奇旅》中的乔,他眼中的“体制”是稳定的中学教师工作,他将其视为束缚梦想的牢笼。他厌恶这份工作所代表的“按部就班”和“放弃梦想”。其追求的是高度去体制化的爵士乐演出,靠才华和人脉获得机会,充满不确定性。乔向往的不是另一个“更好的体制”,而是体制之外的状态——以自主选择与个人能力定义人生。西方教育培养个体的独立思考与自主选择意识,体现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对体制规训的警惕与对个体自由的推崇。

3.2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差异。为什么中国职场人倾向于追求体制内,而美国职场人更愿意冒险追求自由?霍夫斯泰德的“不确定性规避”概念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不确定性的规避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倾向于建立严格的规则以消除不确定性;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则对风险更为包容。

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在《浪浪山小妖怪》中,这种文化心理具象化为对“编制”的依恋。即便浪浪山的压榨如此残酷,小妖怪们仍然不敢轻易离开。因为离开意味着失去身份、认可与安全保障。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使他们宁愿忍受压榨,也不敢拥抱未知的可能。蛤蟆精在逃离浪浪山的途中,始终保留身份凭证,面对招安优先选择回归稳定。此外,即使小猪妖向往取经团队,也是基于对“确定性正道”与稳定归宿的想象。上述均是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具象体现。

美国文化则属于典型的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在《心灵奇旅》中,这种文化具象化为乔放弃稳定教职、追求即兴爵士舞台,愿意承受收入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风险与创造中确认自我存在,正是对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生动表达。

3.3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分野。霍夫斯泰德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体融入集体的程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总体中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追求自由与多样性。相反,集体主义的社会总体比较强调集体的利益,更加注重集体的荣誉感和幸福感。集体主义社会结构紧密,核心是“我们”的意识,强调归属感、和谐与集体决策。而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松散,核心是“我”的意识,强调个人成就、自主权和竞争力。

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其自我建构是关系性的。中国所说的“关系”通常指以某种方式把两个人联结起来,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联系。一个人是谁、有何价值,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和角色关系所定义。在《浪浪山小妖怪》中,小猪妖的痛苦不仅来自物质上的被剥削,更来自精神上的“不被看见”。他不敢向母亲袒露真实处境,因为那会让母亲失望从而破坏家庭期待与集体认同。因此,其自我实现路径是“被认可”——被体制接纳为正式成员(取经团队或佛祖座下)。这与东方教育理念高度一致,家庭与学校均强调个体对集体的融入,将个人价值与集体期待绑定,让个体的职业追求以获得家庭、社会、体制的认可为核心。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其自我建构则是内指性的。在西方个人主义教育下,一个人是谁,不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他内在的特质、选择和价值追求决定的,强调个体的独特性与自主性,核心是“发现自我、成为自我”。乔的困境无关于“不被看见”,而在于“不认同自我”。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将自我价值绑定于“爵士钢琴家”这一身份标签。他的救赎路径是内在的觉醒——意识到意义不在外在的成功标签,而在对当下的感知之中。

3.4 对自由内涵的文化差异。对于小猪妖而言,自由首先意味着“逃离”——逃离上层的压榨、逃离被当作耗材的命运,但他的自由是从不良环境转向良性秩序的自由,并不追求彻底脱离体制与规训。在他心中,人生最好的归宿仍然是“修成正果”、“位列仙班”,自由的终点,仍是稳定归属与向上流动。这体现了东方教育对自由的解读,始终与集体框架绑定,所谓自由是“在既定规则中获得更好发展空间”,而非突破规则的绝对自由。

于乔而言,自由意味着“追求”——追求热爱的事业、追求自我实现、追求内心认定的价值。他强调摆脱外在标准束缚,以内心激情定义人生。最终回归日常,走出对欲望的执着,找到自己作为欲望主体而存在的理由与依据,回到了原初那个热爱音乐、珍惜生活的自我,实现了“欲望的自由”。这种回归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对体制的臣服,其核心是“做自己”。这体现了西方教育对自由的解读核心是个体的自主选择,教育的核心便是培养个体跟随内心做选择、不受外在框架束缚的能力。

3.5 价值归宿与理想人生想象。《浪浪山小妖怪》中,最后小猪妖一行人获得孙大圣认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庇护关系,预示其有望脱离底层、进入更优体制。这是一种向上流动的想象,但仍在体制框架内。这与东方教育在既定轨道上走得更高、更稳、更被社会承认一致。

《心灵奇旅》中,乔完成心心念念的乐队演出后感到空虚,最终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生命自由。他仍然是一名音乐教师,但他

不再用“成功”来衡量自己,学会了在平凡中扎根。这是一种向下扎根的想象——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向内深化,在现有的位置上找到意义。这与西方教育忠于自己、在平凡感知中精神自足一致。

两种结局,反映了两种文化对“理想人生”的不同想象:东方倾向于“变得更好”——在体制内获得更高位置、更多认可;西方文化倾向于“活得更真”——超越外在标准,回归内心真实,而教育在这种想象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的塑造角色。

4 结论

本文以跨文化比较视角,结合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对《浪浪山小妖怪》与《心灵奇旅》中的差异进行解析。

研究表明,中西方职场文化不同于中西方教育的核心导向深度关联,教育既是文化传递的载体,也是职场价值取向塑造的重要力量。

中国教育文化根植于集体主义传统和高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体制既是压榨的来源,也是庇护的依托。个体追求体制内优化与向上流动;西方教育文化则根植于个人主义传统和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体制常常被视为个体自我实现的阻碍,强调超越外在规训、活出真实的自我。

两种文化并无优劣之分,而是不同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东方教育培养的个体具有强集体归属感与规则意识,西方教育培养的个体具有强独立思考能力与探索精神。在全球化与文化交融背景下,理解上述文化差异,有助于当代青年人更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处境。此外,东方教育可融入更多个性化引导与职业探索实践,让个体在集体框架中实现自我价值;西方教育可吸收集体主义教育优势,培养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协作能力,让自我实现与集体发展相融合。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借鉴的可能——既接纳文化基因带来的稳定需求,也适度倾听内在热爱;既重视关系与集体认同,也保留自我觉醒与精神独立的空间,实现中西方智慧的互补与融合。

[参考文献]

- [1]王菲,文梦飞.从“内卷”到“躺平”:对当代青年人心态的思考[J].郑州师范教育,2023,12(02):23-26.
- [2]李渝.从跨文化角度看中国人际关系与直销[J].商场现代化,2005,(21):68-69.
- [3]黄永红.跨文化交际学教程[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2009,(12):126-129+185.
- [5]孙彩慧.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看中西方价值观[J].现代交际,2015,(10):63.
- [6]沈婷婷.精神分析视域下电影《心灵奇旅》中的欲望表达[J].戏剧之家,2022,(09):160-162.

作者简介:

陈敏(1977--),女,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单位:长沙理工大学,职称: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

王玉姿(2005--),女,湖南湘潭人,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学。